

7月25日至8月8日,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、文化部艺术司、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、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,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进行了为期15天的展演,为观众们捧上了一道具有少数民族独特民族风情、独存的民俗文化、独有的民族文化艺术魅力的戏剧大餐,为观众提供了一次真正的荡气回肠、触及心灵的艺术享受。

7月25日晚,内蒙古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,与以往不同,今年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本着节俭的理念,取消了开、闭幕式晚会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乌兰,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团英,自治区副主席王玉明,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董恒宇,国家民委、文化部相关负责人等出席了开幕式。呼和浩特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王雪峰,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会长谭志湘为开幕式致辞,参赛剧目之一的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的大型民族舞台剧《马可·波罗传奇》在开幕式上精彩呈现,拉开了本届会演的帷幕。

此次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仍然以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,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”为主题,汇集了各少数民族近年来的优秀文艺作品,共演出了14台将近30场精品剧目,可以说是精品迭出、风格迥异、精彩纷呈。此次会演参演的剧目来自内蒙古、云南、浙江、吉林、山东、湖北等地的艺术团,分别是大型民族舞台剧《马可·波罗传奇》、吉林省戏曲院吉剧团的吉剧《贵妃还乡》、云南曲靖市滇剧花灯剧非物质文化遗址保护传承展演中心的滇剧《大唐公主》、山东省聊城市山东梆子剧团的山东梆子《萧城太后》、浙江省委剧团的婺剧《穆桂英》、湖北恩施州咸丰南剧团的南剧《女儿寨》、浙江省京剧团的京剧《孔雀翎》、云南文山州壮剧团的壮剧《彩虹》、河北唐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皮影工作室人与影同台的人·影童话剧《飞鱼祭》、北京市曲剧院的曲剧《烟壶》、吉林延边歌舞团的唱剧《沈清传》、内蒙古包头市漫瀚艺术剧院的漫瀚剧《草原·阿妈》、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回族艺术团歌舞剧《曼苏儿》、云南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的傣剧《刀安仁》。

剧目演出期间,由国家民委、文化部、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派出的评委会专家组观看演出之后,结合剧目的创作将举办三次戏剧创作表演艺术座谈会,就艺术创作、演出体会和市场运作进行交流和探讨。

名家集聚 珍品荟萃

与前两届相比,本届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规模更大、影响力更广、获奖剧目更多、演员阵容更强。前两届各有12台剧目参加会演,今年是14台,少数民族题材和地方题材戏剧种类也较往年更多。京剧《孔雀翎》是浙江京剧团2004年创排的,是人国的14台剧目中唯一的原创京剧剧目,其舞台样式的新颖、演出阵容的整齐、演出技艺的高超以及所倡导的“保护动物、保护环境、保护自然”的主题深受观众喜爱,演出至今已经整整10周年,全国巡演共623场。山东梆子《萧城太后》的主演——聊城市山东梆子剧院知名表演艺术家章兰,在山东梆子粗犷质朴的美学风格上,融入了京剧的文气、细腻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,在《萧城太后》一剧中将契丹太后萧燕燕这个角色刻画得鲜活丰满、韵味十足,让人过目难忘。

本届少数民族戏剧会演有3个少数民族剧种的剧目参赛,分别是壮剧《彩虹》、傣剧《刀安仁》和唱剧《沈清传》。傣剧《刀安仁》是云南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酝酿10年的大型近代历史傣剧,之前推出的傣剧《南西拉》曾在第二届



《女儿寨》剧照



《大唐公主》剧照



《萧城太后》剧照



《穆桂英》剧照



少数民族戏剧精品迭出

——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综述

□申文



《马可·波罗传奇》剧照



《贵妃还乡》剧照

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中获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“金孔雀”综合大奖。这次的《刀安仁》在保留传统艺术的基础上,在舞蹈、音乐、场景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,是傣剧发展中的另一个里程碑,该剧结合傣族独特的歌舞表演和佛经讲唱,演绎了傣族民主革命先驱刀安仁,从一个封建领主毅然投身辛亥革命,最后羽化成为舍家为国的民族英雄的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。壮剧《彩虹》是根据流传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壮族叙事长诗《幽骚》改编而成,讲述一对壮族青年为反抗土司的压迫,逃到远方成为夫妻的故事。该剧演出至今已逾24年,是文山州壮剧团成立以来演出场次最多、演出时间最长的一台保留剧目。文山州壮剧团是一个来自祖国西南边疆的基层剧团,条件十分艰苦,这次排演《彩虹》遇到很多

困难:经费不足、部分人员调离、乐队不健全、没有剧场合成,在云南省玉溪市花灯剧团的大力支援和帮助下,仅用极少的经费支撑起了这台民族性、剧种性突出的歌颂爱情、歌颂抗争的剧作。

这次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还上演了一批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,如人·影童话剧《飞鱼祭》、南剧《女儿寨》,特别是失传50余年的吉林省朝鲜族唱剧《沈清传》,是本届会演的一大看点。唱剧《沈清传》根据朝鲜族家喻户晓的古老民间故事改编,讲述一个叫沈清的女子出生7天丧母,与盲父二人相依为命,乞讨度日,后被梦云寺僧人欺骗,沈清为了让父亲复明,卖身商贾充当投海供品跳入水中,龙王被她的孝心感动,以莲花为船送她回人间并献人王宫成为王后,最后至诚感

天,让所有盲人得以复明。这个感动天地的孝女传奇故事曾在19世纪被改编成唱剧。唱剧是朝鲜族戏曲剧种,原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说唱形式,起初由一人多角、长篇独演,发展为多人多角,后又加入民族管弦乐伴奏,逐渐形成以说唱为主,与音乐、舞蹈、舞美相结合的综合性舞台艺术。为了参加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,自去年12月开始,延边歌舞团就着手策划、排演,让差点失传的唱剧《沈清传》得以重新登上舞台,不仅填补了延边歌舞团排演唱剧的空白,还让这一古老剧种焕发出新的魅力。人·影童话剧《飞鱼祭》采用的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舞台表现形式——“木偶同台”的综合表现形式,它以传统皮影艺术表现为主,现代皮影和歌舞表现手段为辅。《飞鱼祭》的故事来源于台湾省东南海域的一

阿昌族的人口较少,但有一大批人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。孙家申、杨叶生、曹先强、罗汉、孙宝廷、曹明强、孙家林、赵家福等人,有的努力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、整理工作,有的则积极进行个人的文学创作,极大地繁荣了阿昌族的文学花园。本期推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春等人对孙家申、杨叶生、罗汉、曹明强的采访。

保护阿昌族共同的精神家园

——当代阿昌族作家访谈



孙家申

杨叶生

罗汉

曹明强

问:请简单介绍您的创作情况。
孙家申:我发表过《双轮双犁犁苦》《燕窝的歌》《凤尾竹下丝纤扬》等作品,后来写了一些关于阿昌族酒文化的研究文章。我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,但是看到别的民族的作家写了很多文学作品,自己也咬紧牙关写了一些粗制品。我今年78岁了,我们这一代人起的是抛砖引玉的作用,后来兴起的文学新人写得越来越好了。

杨叶生:我1961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,毕业以后回到云南从事教学,同时进行阿昌族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。1974年,我开始收集阿昌族的民歌。1979年,随着形势的变化,国家对民族文化更加重视,云南省民委专门组织了一个阿昌族民间文学调查组,来到梁河县进行调查。这次调查的目的有两个:一是调查阿昌族的民间文学到底有什么;二是重点搜集、整理阿昌族的史诗《遮帕麻和遮米麻》。1983年,这部史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为了让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,我们当时经历了很多的困难。

罗汉:我小时候虽然没有读太多的书,但来到部队以后就尝试写作。我起初是写小时候所经历的乡村生活,后来转向写部队战士的生活,所采用的文体主要都是小说。长篇小说《紫雾》、中篇小说《红泪》分别获得第六届和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,我自己较为满意的小说是写阿昌族人生活的《刀匠磨茶》和写部队生活的《两地螺旋》。现在,我还在写小说,但也花很多的时间来写影视剧本。写小说,作家相对自由一些,可以对描写的对象进行精雕细刻;写剧本,要考虑制片方的要求,剧本一般都讲究简洁、明了,也并不好写。但是,作家写剧本,物质回报相对要高一些,而且作品会被更多的人接受。

曹明强:我主要是写诗歌。我1982年在《云南日报》上发表了第一首诗,叫做《踏起来,窝罗》。后来,发表的诗歌就越来越多了。我们阿昌族人很善于唱歌,我自己也喜欢唱,还编了一本《中国阿昌族情歌选》。我始终觉得,诗歌对我来说,有着一一种特别的意味。如果能够写出令自己满意的诗句,我会感到非常兴奋。比如在《山乡之夜》这首诗中,“潮湿的被窝里蠕动着女人的叹息”这个句子我就很喜欢。我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发现,但可能因为自己的汉语水平不够好,没法将之完美地表达出来,这是一个遗憾。

问: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?在创作的过程中,曾受到哪些作品的影响?
罗汉:很多作家,比如莫言、马原、洪峰等,写得都很好,他们的作品我都很喜欢。每当看到一部好的作品,我就会不自觉地去分析它为什么好、好在哪些地方。我觉得,在写作上,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兵,还需要不断地学习怎样去安排章节、调度描写的技巧等。

曹明强:我喜欢读杜甫的诗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小说,后来也经常读鲁迅的作品。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莎士比亚的戏剧。他所写的故事非常迷人,语言也很精美,读起来太有趣味了。还有妈妈给我讲的那些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,对我的写作也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。

问:通过作品,主要想表达什么?
罗汉:我的写作,经常是因为觉得一个事件好玩,就动笔写了。在写之前,我并没有太多预设的目的。写完之后,我发现,很多作品的题目都跟颜色有关,比如《紫雾》《红泪》《绿雪》等。我觉得“紫雾”、“红泪”、

“绿雪”等,都是很美好的事物。《紫雾》写的是边地的缉毒斗争,描写武警去当“卧底”的经历,整个叙述有一种神秘感,“紫雾”这个标题和内容是契合的。《红泪》写的是一位女同志的悲惨命运,她流出来的眼泪和血是同一个颜色,标题“红泪”就是其命运的一种象征。或许,我的写作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一些事件、对于现实人生的个人感觉。

曹明强:我早期的诗着重写我的妈妈、我的大山、我的民族。我们这个民族人数很少,很多人因此心怀自卑,但我要去歌颂自己的民族,让他们对自己的民族产生认同感。这些年来,在政策的支持下,我们民族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,大家的民族自豪感被激发出来了。我想,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去表现,强化这种心理。

问:“民族身份”对创作有没有影响?
孙家申:阿昌族文学是从民间文学起步的。我们编辑出版了两册《民间文学资料集》,在阿昌族人民中受到很大的欢迎。阿昌族的“踏窝罗”是诗乐舞合一,它的唱词翻译成汉文就是一首诗。我的叙事长诗《燕窝的歌》就是在民间文学的启发下写出来的,主要是描述阿昌族的苦难历史以及阿昌族人的奋斗历程。

杨叶生:搜集、整理这些民间文学,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保存好本民族的文学传统,另一方面则希望更多的青年作家能够从中汲取营养。在我看来,真正能够站得住脚的民间文学作

品,要有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、民间文化作为基础,因此民间文学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可喜的是,在曹先强、孙宝廷、赵家福、曹明强等阿昌族作家的作品中,我们都会或多或少找到民族历史、民族文化的印迹。

罗汉:在创作上,我没有受到阿昌族民间文学太多的影响。但是,从那些涉及阿昌族的篇章中,还是很容易就能看到我对本族人民的理解。阿昌族人从不争强好胜,在与其他民族的相处中,他们非常善于调和矛盾,与他人和谐相处。民族文化不仅仅是你所穿的服饰、你所唱的民歌,还应包括本民族深层的苦难史和奋斗史。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,我们一方面要积极保护那些有意义的东西,另一方面应该接受外来的先进的东西。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继承,可能就会变得过于保守。

曹明强:民间文学直接启蒙了我的写作,所以我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学都特别珍视。我现在在进行阿昌族史诗《遮帕麻和遮米麻》的翻译,同时还努力地去保护阿昌族的语言。阿昌族语言是我们民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是我们阿昌族人共同的精神家园。如果阿昌族语言不存在了,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体系就只能依靠汉语了,这是非常可怕的。要保留阿昌族的语言,就应该把它记录下来,比如把它和汉语进行对译,做成一个大辞典。这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。

问:对阿昌族青年作家有何期待?他们应该如何平衡好生活与写作?
孙家申:现在阿昌族有很多年轻的写作者,他们大都上了大学,文化层次有了提高。但基本都是业余进行写作,没有专业作家。而且,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组织这些写作者,还没有形成一种合力。对于阿昌族文学,我觉得“回头看我们有进步,是向前看我们要跑起来”。我希望年轻的写作者能够把改革开放以来阿昌山寨的巨变,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来。

罗汉:我不主张文学完全地市场化、商业化,但有一部分作家应该尝试着走向市场。走向市场,甚至迎合市场写作,有时候是为了解决生计。如果一个作家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,吃不饱、穿不暖的,很难有心境去写作品。当然,如果政府能够给有才华的作家提供一些物质方面的帮助,他们就可能免除这方面的顾虑,有更多的时间去写作。

曹明强:就我个人而言,写作就是要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我自己一方面在种植茶叶,一方面在坚持写作。如果我只种茶,就体会不到写作带来的内心愉悦;如果我只写作,就很难体验到种茶的那份怡然。种茶与写诗,甘苦自在其中。我总觉得,一个丰富的人,他的思想应该是“战斗”的,他的肉体也是“拼搏”的。既要在俗世中打拼,也要在精神世界里遨游,因此,我必须坚持写作。

(采访者:杨春、钟进文、孔林林、姜可欣、胡艳红、张楠、杨金超、王亚楠)

少数民族当代作家系列访谈(五)